

新青年

陈独秀 李大钊 瞿秋白 主撰

敬告青年·陈独秀/文学改良刍议·胡适/我的
马克思主义观·李大钊/狂人日记·鲁迅/一个
青年的梦/论中国当用世界公历纪年·钱玄同/
文学革命论/女子问题/它所发起的思想启蒙运
动·启动了中国从封建专制向现代民主转型的
历史车轮。凡追求进步之青年·无不视《新青
年》为旗帜·以《新青年》为明灯。

NEW
YOUTH
第8卷

二十世纪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名刊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青年 .8 / 陈独秀, 李大钊, 瞿秋白主编. -- 北京 :
中国书店, 2011.7

ISBN 978-7-5149-0041-5

I. ①新… II. ①陈… ②李… ③瞿… III. ①期刊—
汇编—中国—民国 IV. ①Z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01839 号

责任编辑: 钟 书

总 策 划: 王 兵

书 名: 新青年 (第八卷)

作 者: 陈独秀 李大钊 瞿秋白 主撰

出 版: 中国书店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琉璃厂东街 115 号

邮 编: 10005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祥达印装厂

规 格: 700mm×1000mm 16 开本

42.5 印张 762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49-0041-5

定 价: 1600.00 元 (全十二册)

第一号 目次

1 / 谈政治	陈独秀
9 / 《社会主义史》序	蔡元培
12 / 中学国文的教授	胡 适
22 / 新历史	陶孟和
29 / 对于时局的我见	陈独秀
31 / 诗	
○ 一个农夫	○ 泥菩萨（双明）
○ 紫踟躅花之侧	○ 庐山纪游
○ 斗虎五解（康白情）	
35 / 新闻记者	Bjorson著 沈性仁 译
50 / 风波（小说）	鲁 迅
56 / 小雨点（小说）	陈衡哲
60 / 女子将来的地位	汉俊 译
67 / 俄罗斯研究	
（一）俄罗斯苏维埃政府	张慰慈 译
（二）俄罗斯同业组合运动	汉俊 译
（三）我在新俄罗斯的生活	汉俊 译
83 / 社会调查	
（一）湖北河南间底风俗	马伯援
（二）汉口苦力状况	刘云生
（三）武昌五局工人状况表	文华大学学生
97 / 香港罢工风潮始末记	记 者
103 / 随感录	陈独秀
105 / 杜威博士讲演录	孙伏园 记
119 / 通信	

谈政治

○ 陈独秀

(一)

本志社员中有多数人向来主张绝口不谈政治，我偶然发点关于政治的议论，他们都不以为然。但我终不肯取消我的意见，所以常常劝慰慈、一涵两先生做关于政治的文章。在他一方面，外边对于本志的批评，有许多人说《新青年》不讨论政治问题，是一个很大的缺点。我对于这个批评也不能十分满足，曾在《我的解决中国政治方针》演说中回答道：“我们不是忽略了政治问题，是因为十八世纪以来的政治已经破产，我们正要站在社会的基础上造成新的政治；我们不是不要宪法，是要在社会上造成自然需要新宪法底实质，凭空讨论形式的条文，是一件无益的事。”因此，可以表明我对于政治底态度，一方面固然不以绝口不谈政治为然，一方面也不愿意和一班拿行政或做官弄钱当作政治的先生们谈政治。换句话说，就是：你谈政治也罢，不谈政治也罢，除非逃在深山人迹绝对不到的地方，政治总会寻着你的。但我们要认真了解政治底价值是什么，决不是争权夺利的勾当可以冒牌的。

以上的说话，虽然可表明我对于政治底态度，但是过于简单，没有说出充分的理由，而且不曾包含我最近对于政治的见解，所以现在要详细谈一下。

(二)

我们中国不谈政治的人很多，主张不谈政治的只有三派人：一是学界，张东荪先生和胡适之先生可算是代表；一是商界，上海总商会和最近的各马路商界联合会可算是代表；一是无政府党人。前两派主张不谈政治是一时的不

是永久的，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因为他们所以不谈政治，是受了争权夺利的冒牌的政治底刺激，并不是从根本上反对政治。后一派是从根本上绝对主张人类不应该有一切政治的组织，他们不但反对君主的贵族的政治和争权夺利的政治，就是民主的政治也要反对的。

我对于这三派的批评：在消极的方面，我固然很有以他们为然的地方；在积极的方面，我就有点异议了。

前两派只有消极没有积极的缺点，最近胡适之先生等《争自由的宣言》中已经道破了。这篇文章开口便说：“我们本不愿意谈实际的政治，但是实际的政治却没有一时一刻不来妨害我们。”要除去这妨害，自然免不了要谈政治了。

后一派反对政治，从消极的方面说起来，也有一大部分真理。他们反对政治、反对法律、反对国家、反对强权，理论自成一系统，到没有普通人一面承认政治、法律、国家，一面反对强权的矛盾见解。强权是少数人的或多数人的，广狭虽然不同，但若是没有强权便没有法律，没有法律还有什么政治国家呢？因此我们应该明白强权、国家、政治、法律是一件东西底四个名目，无政府党人一律反对，理论倒算是一贯。古代的社会契约（Social contract）和中世纪的自治都市（Commune），不但不是普遍的，而且是人类政治组织没有进化到近代国家的状态。近代国家是怎样？Franz Oppenheimer说：国家底唯一目的，就是征服者支配被征服者底主权，并且防御内部的叛乱及外部的侵袭。这主权底目的，也就是征服者对被征服者经济的掠夺（详见Christensen's Politics and Crowd Morality, P. 72所引）。Christensen说：“国家是掠夺别人并防止别人来掠夺的工具。它的目的并不是制止每人和每人间底战争，乃是使这战争坚固而更有效力。”（见前书73、74页）罗素说：“国家底骨子，就是公民集合力底仓库。这力量有两个形式：一是对内部的，一是对外部的。对内部的形式是法律及警察；对外部的形式是战斗力所表现的陆海军。国家是一定区域内全住民底集合体依政府指挥用他们联合力所组织起来的。国家底权力，对内仅限于叛乱的恐怖，对外仅限于战败的恐怖，所以它阻止这两样是绝对的。在实际上它能够用租税名义夺人家底财产，决定结婚和继承底法律，惩罚它所反对的意见发表，因为要把一种人民所住的地方划归别国它能置人于死地，并且它想着要打仗便命令一切强健男子到战场去赌生命。在许多事件上，违反了国家底目的和意见，就是犯罪。”（见Russell's Principles of Social

Reconstruction, P. 45. 46. 47) 过去及现在的国家底作用实在是如此, 我所以说无政府党反对国家、反对政治、反对法律、反对强权, 也有一大部分真理。

从消极方面说起来, 无政府党否认国家政治, 我们固然赞同; 从积极方面说起来, 我们以为过去的现在的国家和政治, 过去的现在的资本阶级的国家和政治, 固然建筑在经济的掠夺上面。但是将来的国家和政治, 将来劳动阶级的国家和政治, 何人能够断定他仍旧黑暗绝对没有进步的希望呢? 反对国家的人, 说他是掠夺机关; 反对政治的人, 说他是官僚底巢穴; 反对法律的人, 说他是资本家私有财产底护符。照他们这样说法, 不过是反对过去及现在掠夺的国家, 官僚的政治, 保护资本家私有财产的法律, 并没有指出可以使国家、政治、法律根本摇动的理由。因为他们所反对的, 不曾将禁止掠夺的国家, 排除官僚的政治, 废止资本家财产私有的法律, 包含在内。

或者有人说: “就是将来的禁止掠夺的国家, 排除官僚的政治, 废止资本家私有财产的法律, 仍然离不掉强权, 所以不从根本上绝对废除国家、政治、法律这几种强权, 实现自由组织的社会, 不能算彻底的改革。”

我们对于这种意见, 可以分开理论和事实两方面的讨论:

从理论上说起来, 第一我们应该要问: 世界上的事理本来没有底, 我们从何处起? 所以懂得进化论的人, 不应该有彻底不彻底的观念。第二我们应该要问: 强权何以可恶? 我以为强权所以可恶, 是因为有人拿它来拥护强者无道者, 压迫弱者与正义。若是倒转过来, 拿它来救护弱者与正义, 排除强者与无道, 就不见得可恶了。由此可以看出强权所以可恶, 是它的用法, 并不是它本身。我们人类文明最大的效果, 是利用自然、征服自然。例如水火都可以杀人, 利用水便得了行船、洗濯、灌溉底效用; 利用火便得了烧饭菜、照亮、温暖身体底效用; 炸药和雷电伤人更是可怕, 利用他们便得了开山治病及种种工业上的效用; 人类底强权也算是一种自然力, 利用他也可以有一种排除黑暗障碍底效用。因此我觉得不问强权底用法如何, 闭起眼睛反对一切强权, 像这种因噎废食的办法, 实在是笼统的、武断的, 决不是科学的。若有人不问读书底目的如何, 但只为读书而读书; 不问革命底内容如何, 但只为革命而革命, 自然是可笑。现在若不问强权底用法如何, 但只为强权而反对强权, 或者只为强权而赞成强权, 也未免陷于同一的谬误。

从事实上说起来, 第一我们要明白世界各国里面最不平, 最痛苦的事, 不

是别的，就是少数游惰的消费的资产阶级，利用国家、政治、法律等机关，把多数勤苦的生产的劳动阶级压在资本势力底下，当做牛马机器还不如。要扫除这种不平，这种痛苦，只有被压迫的生产的劳动阶级自己造成新的强力，自己站在国家地位，利用政治，法律等机关，把那压迫的资产阶级完全征服，然后才可望将财产私有，工银劳动等制度废去，将过于不平等的经济状况除去。若是不主张用强力，不主张阶级战争，天天不要国家、政治、法律，天天空想自由组织的社会出现，那班资产阶级仍旧天天站在国家地位，天天利用政治、法律。如此梦想自由，便再过一万年，那被压迫的劳动阶级也没有翻身的机会。法国底工团派，在世界劳动团体中总算是很有力量的了。但是他们不热心阶级战争，是要离开政治的，而政治却不肯离开他们，欧战中被资产阶级拿政权强迫他们牺牲了，今年五一节后又强迫他们屈服了，他们的自由在那里？所以资产阶级所恐怖的，不是自由社会的学说，是阶级战争的学说。资产阶级所欢迎的，不是劳动阶级要国家政权法律，是劳动阶级不要国家政权法律。劳动者自来没有国家，没有政权，正因为过去及现在的国家、政权都在资产阶级底手里，所以他们才能够施行他们的生产和分配方法来压迫劳动阶级。若劳动阶级自己宣言永远不要国家，不要政权，资产阶级自然不胜感谢之至。你看现在全世界底国家对于布尔塞维克底防御、压迫、恐怖，比他们对于无政府党利害的多，就是这个缘故。

第二我们要明白各国底资产阶级，都有了数十年或数百年底基础，站在优胜的地位，他们的知识、经验都比劳动阶级高明得多，劳动阶级要想征服他们固然很难，征服后想永久制服他们不至死灰复燃更是不易。这时候利用政治的强权，防止他们的阴谋活动；利用法律的强权，防止他们懒惰、掠夺，矫正他们的习惯、思想都很是必要的方法。这时候若反对强权的压迫，若主张不要政治、法律，若提倡自由组织的社会，便不啻对资产阶级下了一道大赦底恩诏，因为他们随时得着自由，随时就要恢复原有的势力地位。所以各国共和革命后，民主派若失了充分压服旧党底强力，马上便有复辟底运动。此时俄罗斯若以克鲁巴特金的自由组织代替了列宁的劳动专政，马上不但资产阶级要恢复势力，连帝政复兴也必不免。克鲁巴特金《国家论》中所称赞的中世自治都市是何以失败的，他所指责的近代资本主义的国家是何以发达起来的？这主要的原因，不用说一方面是自治都市里既不是以劳动阶级为主体，又没有强固的政治

组织，因此让君主贵族们垄断了政权；一方面是新兴的资本家利用自由主义，大家自由贸易起来，自由办起实业来，自由虐待劳动者，自由把社会的资本集中到少数私人手里，于是渐渐自由造成了自由的资本阶级，渐渐自由造成了近代资本主义自由的国家。我们明明白白晓得中世自治都市是放弃政权失败的，是放任那不法的自由（Unconscionable Freedom）失败的，劳动阶级底枷锁镣铐分明是自由主义将他带上的。现在理想的将来的社会，若仍旧妄想否认政治是彻底的改造，迷信自由主义万能，岂不是睁着眼睛走错路吗？我因此深信许多人所深恶痛绝的强权主义，有时竟可以利用它为善；许多人所歌颂赞美的自由主义，有时也可以利用它为恶，万万不可一概而论。因为凡强权主义皆善，凡自由主义皆恶，像这种笼统的大前提，已经由历史底事实证明它在逻辑上的谬误了。

第三我们要明白人类本性的确有很恶的部分，决不单是改造社会制度可以根本铲除的。就是社会制度——私有财产制度、工银劳动制度——所造成的人类第二恶性，也不是制度改变了这恶性马上就跟着消灭的。工银劳动制度实在不应该保存，但同时若不强迫劳动，这时候从前不劳动的人，自然不会忽然高兴去做工；从前受惯了经济的刺激（Economic Stimulus）才去劳动的工人，现在解除了刺激，又加上从前疲劳底反动，一定会懒惰下来，如此一时社会的工作效率必然锐减。少数人懒惰而衣食，已经酿成社会上的不平等。若由少数增至多数，这社会底生活资料如何维持呢？人类诚然有劳动的天性，有时也自然不须强迫。美术化的劳动和创造的劳动，更不是强迫所能成的，自来就不是经济的刺激能够令他进步的，所以工银制度在人类文化的劳动上只有损而无益。至于人类基本生活的劳动，至少像那不洁的劳动、很苦的劳动，既然没有经济的刺激，又没有法律的强迫，说是人们自然会情愿去做，真是自欺欺人的话。凡有真诚的态度讨论社会问题的人，不应该说出这样没有征验的话来。制度变了，制度所造成的人类专己自私的野心，一时断然不易消灭。倘然没有法律裁判这种倾向，专制的帝王贵族就会发生在自由组织的社会里。若要预防它将来发生，抵抗它已经发生，都免不了利用政治的法律的强权了。更有一件事，就是人类底性欲本能和永续占有行动合起来发生的男女问题。这问题是人生问题中最神秘不可思议的部分，不但社会制度革命不能解决他，并且因为解除了经济的政治的压迫和诱惑，真的纯粹的男女问题更要露骨的发生。这时候的男女

问题内，并不夹杂着政治的经济的影响和罪恶，倘由这种问题发生了侵犯个人及损害社会安宁的罪恶，也应该有点法律的裁制才好。

据以上的理论和事实讨论起来，无政府党所诅咒的资产阶级据以造作罪恶的国家、政治、法律，我们也应该诅咒的。但是劳动阶级据以铲除罪恶的国家、政治、法律，我们是不应该诅咒的。若是诅咒他，倒算是资产阶级底朋友了。换句话说，就是我们把国家、政治、法律，看做一种改良社会的工具，工具不好，只可改造他，不必将它抛弃不用。

(三)

不反对政治的人也有两派：一是旧派，他们眼中的国家，就是“我国家数百年深仁厚泽”的国家，“学生这样嚣张还成个什么国家”的国家；他们眼中的政治，就是“吴佩孚只是一个师长不配参与政治”的政治；他们眼中的法律，就是“王法”“国法”“大清律”的法律。这派底意见，我们犯不着批评。一是新派，他们虽不迷信政治、法律和国家有神秘的威权，他们却知道政治、法律和国家是一种工具，不必抛弃不用。在这一点上我很以他们为然，但是他们不取革命的手段改造这工具，仍旧利用旧的工具来建设新的事业，这是我大不赞成的。这派人所依据的学说，就是所谓马格斯修正派，也就是Bebel死后德国底社会民主党，急进派所鄙薄所攻击的社会党也就是这个。中国此时还不够不上说真有这派人，不过颇有这种倾向，将来这种人必很有势力要做我们唯一的敌人。

他们不主张直接行动，不主张革那资产阶级据以造作罪恶的国家、政治、法律底命，他们仍主张议会主义，取竞争选举的手段，加入（就是投降）资产阶级据以作恶的政府、国会，想利用资产阶级据以作恶的政治、法律，来施行社会主义的政策。结果不但主义不能施行，而且和资产阶级同化了，还要施行压迫劳动阶级反对社会主义的政策。现在英、法、德底政府当局哪个不是如此？像这样与虎谋皮为虎所噬还要来替虎噬人的方法，我们应该当作前车之鉴。

他们主张的国家社会主义，名为社会民主党，其实并不要求社会的民主主义，也不要求产业的民主化，只主张把生产工具集中在现存的国家——现存的资产阶级底军阀官僚盘踞为恶的国家——手里。Wilhelm Liebknecht批评这种国

家社会主义道，这种国家社会主义，实在说起来只可叫做国家资本主义（State Capitalism），取其貌似投时所好来冒牌骗人罢了。德国底国家社会主义，严格说起来就是普鲁士底国家社会主义，它的理想就是军国的、地主的、警察的国家，它所最厌恶的就是民主主义（见Wilhelm Liebknecht, No Compromise, No Political Trading, P.15）。这种国家社会主义的国家里面，劳动阶级底奴隶状态不但不减轻而且更要加重。因为国家成了公的唯一的资本家，比私的多数的资本家更要垄断得多。这种国家里面，国家的权力过大了，过于集中了统一了，由消灭天才的创造力上论起来，恐怕比私产制度还要坏。这种国家里面，不但无政府党所诅咒的国家、政治、法律底罪恶不能铲除，而且更要加甚。因为资产阶级底军阀官僚从前只有政治的权力，现在又假国家社会主义的名义，把经济的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这种专横而且腐败的阶级，权力加多罪恶便自然加甚了。若是把这名义与权力送给世界上第一个贪污不法的中国军阀官僚，那更是造孽不浅。

他们反对马格斯底阶级战争说很激烈，他们反对劳动专政，拿德谟克拉西来反对劳动阶级底特权。他们忘记了马格斯曾说过：劳动者和资产阶级战斗的时候，迫于情势，自己不能不组成一个阶级，而且不能不用革命的手段去占领权力阶级的地位，用那权力去破坏旧的生产方法。但是同时阶级对抗的理由和一切阶级本身，也是应该扫除的，因此劳动阶级本身底权势也是要去掉的（见《共产党宣言》第二章之末）。他们又忘记了马格斯曾说过：“法国社会主义及共产主义的著作，到德国就全然失了精义了，并且阶级争斗底意义从此在德国人手中抹去，他们还自己以为避免了法国人的偏见，他们自以为不单是代表无产阶级利害的，是代表人类本性底利害，就是代表全人类利害的。”这种人类不属于何种阶级，算不得实际的存在，只有哲学空想的云雾中是他存在的地方（见前书第三章）。他们只有眼睛看见劳动阶级底特权不合乎德谟克拉西，他们却没眼睛看见戴著德谟克拉西假面的资产阶级底特权是怎样。他们天天跪在资产阶级特权专政脚下歌功颂德，一听说劳动阶级专政，马上就抬出德谟克拉西来抵制，德谟克拉西到成了资产阶级底护身符了。我敢说：若经过阶级战争，若经过劳动阶级占领权力阶级地位底时代，德谟克拉西必然永远是资产阶级底专有物，也就是资产阶级永远把持政权抵制劳动阶级底利器。修正派社会主义底格言，就是：“从革命去到普通选举！从劳动专政去到议会政治！”

他们自以为这是“进化的社会主义”，殊不知Bebel死后德国底社会民主党正因此堕落了！

(四)

我的结论是：我承认人类不能够脱离政治，但不承认行政及做官争地盘攘夺私的权利这等勾当可以冒充政治。

我承认国家只能做工具不能做主义，古代以奴隶为财产的市民国家，中世以农奴为财产的封建诸侯国家，近代以劳动者为财产的资本家国家，都是所有者的国家，这种国家底政治法律，都是掠夺底工具，但我承认这工具有改造进化的可能性，不必根本废弃他，因为所有者的国家固必然造成罪恶，而所有者以外的国家却有成立的可能性。

我虽然承认不必从根本上废弃国家、政治、法律这个工具，却不承认现存的资产阶级（即掠夺阶级）的国家、政治、法律有扫除社会罪恶的可能性。

我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后事如何，就不是我们所应该所能够包办的了。

《社会主义史》序

○ 蔡元培

我们中国本有一种社会主义的学说，如《论语》记说：“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就是对内主均贫富，对外不取黷武主义与殖民政策。《礼运》记孔子说：“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就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意义，且含有男女平等主义。《孟子》记许行说：“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就是“泛劳动”主义。

中国本又有一种社会政策。《周礼》：“小司徒经土地而井牧其田野。”“遂人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颁田里。”《孟子》说：“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汉书·食货志》：“民年二十受田，六十归田。七十以上，上所养也。十岁以下，上所长也。十一以上，上所强也。”“女修蚕织。”“春令民毕出在野；冬则毕入于邑……入者必持薪樵，轻重相分，斑白不提挈。冬民既入，妇人同巷相从，夜绩女工……必相从者，所以省费燎火，同巧拙而合习俗也。”虽是偏着农业一方面，但不能不认为社会政策的一种。后来宋儒常常想恢复井田，但总没有什么机会。

西洋的社会主义，二十年前才输入中国。一方面是留日学生从日本间接输入的，译有《近世社会主义》等书。一方面是留法学生从法国直接输入的，载在《新世纪》周刊上。后来有《民声》周刊简单的介绍一点。俄国广义派政府成立以后，介绍马克思学说的人多起来了，在日刊、月刊中，常常看见这一类的题目。但是切切实实把欧洲社会主义发起以来，一切经过的情形，叙述出来

的还没有。我友李君懋猷取英国辟司所增订的克卡朴《社会主义史》，用白话译出，可以算是最适用的书了。

克氏此书成于一八九二年，于社会主义的学说，叙述得颇详。但是社会主义派最近的运动，自然有遗漏的。经辟司于一九一三年增订一回，加入的不少。虽然大战以后，俄国新政府的设施，国际联盟条约中劳工规约的讨议，各国同盟罢工的勃起，矿山、铁道国有问题的要求，这些重大事变，还没有包在里面，但是，一九一三年以前的事实，很可以资考证了。

克氏、辟氏都是英国人，自然是稳健派，所以对以前的社会主义，很有消极的批评。又如辩护家庭、辩护宗教、辩护中央与地方政府，甚且辩护英国的殖民政策，读的人一定有嫌他们不彻底的。但是他们所叙述的，给我们的教训已经很多。

在这部书里面说：“现在一般有名的研究家，都承认历史——经济的历史在内——是许多有次序的现象之连续体。凡在连续线内的各种情形，都有种种特别的事实和倾向标明出来。”“一个时代的失败，常指出以后一个时代中成功的道路。”“我们讨论社会主义运动的问题，不独当以历史和人类为准则，还须特别参考现在流行的各种势力——工业的、政治的、社会的和道德的势力。”很可以令我们猛省，知要实行这种主义，必要有各种的研究。不是随便拈出几句话头，鼓吹鼓吹，就有希望的。

他说：“差不多没有一国的工界，像比国工界一样，受那种难以名状的苦痛。从前比国工人毫无知识，作工的时间极长，工价极廉，他们既没有政治上的权利，又没有一点组织，所以常被压制。”这不是我们工界的缩影么？但是“最近几十年来，比国社会主义运动，以组织坚固和包罗宏富两点著名”。

“从英国采入它的协作和自助；从德国采入它的政治上的策略和根本上的原则；从法国采入种种理想的倾向。”它的特点“是它的协作的大组织”“比国的协作社会，已经使比国的工党根深蒂固，在世界各国中，除德意志外，没有能和它相比较的”。这不是我们应该注意的方法么？

他叙工团主义的起源说：“法国人发生三种观念：一、工人阶级在政治上得不到救助；二、国会是一群自谋私利的空谈家，他们只要有官做，或有贿得，他们就会牺牲他们向来的主义；三、中央政府是一个仇敌。”因而工团主义的观点：“一、工界的救援，不在乎政治方面，而在乎自助和自己组织团

体；二、要制胜资本家，不在乎公众所组织之政治性质的团体，而在乎工界所组织之工业性质的团体；三、工人第一是一个作工的人，如做矿工、工程师或制棉工人，第二才做一个国民。”“工团主义是纯粹工界的产物，不是一个人的力量造成的，它是由许多不著名的人之种种意见相合而成的，它的发生是出乎自然的。”我们中国无论什么组织，总是有政客想利用他。那法国的工团主义，不是我们很应该注意的么？

他说：“人类发展之中，有两种要素，是脑力的发达和合群原则的发达。”又说：“从现时过渡到社会主义时代……一定是渐进的，必先做一番预备工夫，使大多数人民的知识、道德、习惯和组织，都合于一种更高的社会经济的生活。”这就是工人教育问题。第一是学者的加入，如“美国各大学校学生中，有许多是社会主义者，这些人中间，有许多是在德国各大学得过学位的。当一九一〇年，各校社会主义社有十支社，到一九一二年，增至五十二支社。”又如英国“费边会在各地方组织支部，在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和别的大学里面，都有支部……近来联合成一个大学社会主义同盟会”。第二是特别的教育，如德国社会民主党有教育委员会，“当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三年的时候，对于经济学、历史、文学、美术、社会主义、哲学、协作运动、工联主义、政治学和各种专门学科，共讲演三千五百次。此外，还公开无数的音乐会、欢迎会和演剧等。”“又有一种活动影片，也是用作传播社会主义之用的。”“柏林有一种社会主义学校。在这个学校里面，每年有三十一个当选的年龄不同之男子和妇女，教授普通史、社会史、宪法史、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的历史和学说，社会和工业的法律，演说术和作文法，新闻事业和别的学科。”“设一个妇女部，预备各种小册子和别种印刷品，在妇女中分发。”“设法使青年和社会主义相接触，组织六百五十个地方委员，专办这一类事务。还办一种特别的新闻纸，名为《劳动少年》。在二百七十四处地方，设有少年图书馆。自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三年，举行演讲会四千五百次，开音乐会和欢迎会二千四百零五次，举行旅行会、博物院参观会等等共一万四千三百次。他又刊布小册子八十二万五千份，分发国内各青年。”这不是我们应该效法的么？

我读了这部译稿，发生许多感想。特将重要一点的写出来，表示我介绍此书的诚意。

中华民国九年七月二十三日

中学国文的教授

○ 胡 适

我是没有中学国文教授的经验，虽然做过两年中学学生，但是那是十几年前的经验，现在已不适用了。况且当这个学制根本动摇的时代，我们全没有现成的标准可以依据，也没有过去的经验可以参考。我这个完全门外汉居然敢来高谈中学国文的教授，真是不自量力了！但是门外汉有时也有一点用处。

“内行”的教育家，因为专做这一项事业，眼光总注射在他的“本行”，跳不出习惯法的范围。他们筹划的改革，总不免被成见拘束住了，很不容易有根本的改革。门外旁观的人，因为思想比较自由些，也许有时还能供给一点新鲜的意见，意外的参考材料。古人说的“愚者一得”，大概也是这个道理。这就是我这回敢来演说“中学国文的教授”的理由了。

（一）中学国文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现在既没有过去的标准可以依据，应该自己先定一个理想的标准。究竟中学的国文应该做到什么地位？究竟我们期望中学毕业生的国文到什么程度？

民国元年的《中学校令施行细则》第三条说：

国文要旨在通解普通语言文字，能自由发表思想，并使略解高深文字，涵养文学之兴趣，兼以启发智德。

这一条因为也是理想的，并不曾实行，故现在看来还没有什么大错误。即如“通解普通语言文字”一句，在当初不过是欺人的门面话，实在当时中学的国文与“普通语言”是无有关系的。但是到了现在国语进行的时候，这六个字反更有意义了。又如“并使略解高深文字”一句，当日很难定一个界说，现在把国语和古文分开，把古文来解“高深文字”，这句话便更容易解说了。

元年定的理想标准，照这八年的成绩看来，可算得完全失败。失败的原因并不在理想太高，实在是因为方法大错了。标准定的是“通解普通语言文字”，但是事实上中学校教授的并不是普通的语言文字，乃是少数文人用的文字，语言更用不着了！标准又定“能自由发表思想”，但是事实上中学教员并不许学生自由发表思想，却硬要他们用千百年前的人的文字，学古人的声调文体，说古人的话，只不要自由发表思想！事实上的方法和理想上的标准相差这样远，怪不得要失败了！

我承认元年定的标准不算过高，故斟酌现在情形，暂定一个中学国文的理想标准：

(1) 人人能用国语（白话）自由发表思想，作文、演说、谈话，都能明白通畅，没有文法上的错误。

(2) 人人能看平易的古文书籍，如《二十四史》《资治通鉴》之类。

(3) 人人能作文法通顺的古文。

(4) 人人有懂得一点古文文学的机会。

这些要求不算苛求吗？

(二) 假定的中学国文课程

定了标准，方才可谈中学国文的课程。现行的部定课程是：

第一年：讲读，作文，习字。共七。

第二年：讲读，作文，习字，文字源流。共七。

第三年：讲读，作文，习字，文法要略。共五。

第四年：讲读，作文，文法要略，文学史。共五。

依我们看来，现在中学校各项功课平均每周男校三十四时，女校三十三时，未免太重了。我们主张国文每周至多不能过五时，四周总数应在二十时以下。现在假定每周五时，暂定课程表如下：

年一：国语文一，古文三，文法与作文一。共五。

年二：国语文一，古文三，文法与作文一。共五。

年三：演说一，古文三，文法与作文一。共五。

年四：辩论一，古文三，文法与作文一。共五。